

社会工作者参与政策实践的三大基础

马凤芝 陈树强*

摘要：社会工作既是基于价值的专业 and 理论驱动的专业，也是回应社会需要的专业。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生态系统理论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构成了社会工作者参与政策实践的三大基础，社会工作者可以且应当利用政策实践方法去实施、完善和创新社会政策。

关键词：政策实践 公平正义 生态系统理论 现实基础

DOI:10.19506/j.cnki.cn10-1428/d.2024.02.003

社会工作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陆续形成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及社区工作等实践方法，尽管社会政策也被纳入到社会工作课程体系之中，但在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它被当作是个人、家庭、小组和社区实践以及社会行政的背景，而不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实践方法来教授的（Gitterman et al., 2020）。换言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社会政策未被认为是一门实践科目，而是被广泛地视为一门描述性和分析性科目。正是有感于社会政策教科书和课程几乎不讨论社会工作者实际上如何改善社会政策，布鲁斯 - 詹森（Bruce S. Jansson）在 1984 年出版的《社会福利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构建出“政策实践”（policy practice）这个概念（Jansson, 2014），以增加该科目的干预要素，企图把该科目建设成一门应用性科目。虽然詹森等学者为推动作为一种社会工作方法的政策实践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政策实践在社会工作实务界和学术界并未得到普遍接受。当人们想到社会工作时，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往往是社会工作者所扮演的微观层次上的角色，忽略了社会工作对于促进重要社会事业和支持弱势人群的强调。虽然社会正义是社会工作专业的目标之一，但事实上政策实践从来都不是大多数社会工作者活动的主要焦点（Gal and Weiss, 2000）。我国也有类似情况。虽然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国恢复了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实践也有所发展，但作为一种社会工作实践方法的政策实践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社会工作实务界偏重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等直接服务的实践方法，许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及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政府部门在考核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时也多以做了多少个案、多少小组等为标准，缺乏动态的政策实践视角。社会工作学术界虽然把政策实践纳入社会工作研究领域，但绝大多数学者并没有把政策实践作为社会工作实践的一种方法，而是把社会政策看作一种静态的制度框架，把社会工作看作是社会政策的传递系统（马凤芝，2014）。然而，在我国大力倡导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中，社会工作要想提高其贡献度就离不开政策实践这种方法，因此，我们有必要阐述社会工作者参与政策实践的价值、理论及现实基础。

* 马凤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树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

一、政策实践的价值基础

价值是社会工作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就是一个基于价值的专业，社会工作实践就是一种道德实践（乔世东，2010）。由于某些共同的价值和伦理原则指导着社会工作这个专业，社会工作者应了解这个专业的价值基础和伦理标准。

在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中，“社会正义”占有突出的地位。社会工作专业对社会正义的承诺是独一无二的。为社会正义而奋斗意味着努力创造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无论年龄、性别、民族、种族、地位、身体或精神状况等如何，所有人都享有同样的基本权利和机会，并能充分发挥其潜力（Segal et al., 2019）。

社会正义这一价值体现在各国乃至国际社会工作联盟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之中。《英国社会工作伦理守则》明确提出，社会工作实践旨在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障碍、不公平和不公正。社会工作者有责任促进社会正义，无论是整体社会上的，还是他们与之一起工作的人们的（BASW, 2021）。《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声称，社会正义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之一，社会工作者应挑战社会不公正。社会工作者推动社会变革，特别是同弱势和受压迫的个人和群体一起并代表他们推动社会变革。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变革努力主要集中在贫困、失业、歧视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不公正议题上。这些活动旨在促进对压迫以及文化和种族多样性的了解。社会工作者努力确保获得所需的信息、服务和资源、机会均等，以及所有人有意义地参与决策。^①《俄罗斯社会工作者和社会教育者伦理指南》宣称，社会正义和人本主义是社会工作和社会教育工作的价值。社会工作者和社会教育者应当揭示造成社会矛盾、社会困难和人民苦难的原因，并作出适当反应，防止其简单化处理；根据其专业活动的机会与层次，影响那些促进人们公平地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政策的形成。^②《韩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规定，社会工作者应该代表在社会和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倡导社会正义、平等、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社会工作者不仅与有需要的人一起工作，帮助他们提高社会地位和技能，而且还参与各种行动提升社会制度的质量。社会工作者应致力于寻求社会正义，并改善服务对象的福祉。社会工作者应要求和倡导旨在改善社会环境和争取社会正义的社会政策的制定、推进、立法和实施。^③《新加坡社会工作者协会专业人员伦理守则》指出，社会工作者推动社会变革，特别是同弱势和受压迫的个人与群体一起并代表他们推动社会变革。社会工作者不仅有义务为他们所服务的人谋福利，也有义务为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和社区谋福利。这一义务可能涉及采取行动，影响和塑造社会条件、政策或服务。社会工作者有责任对被认为对个人、家庭和社区有害的政策和社会状况提出反馈意见。^④国际社会工作者联盟和国际社会工作学院联盟于2018年7月在爱尔兰都柏林

① <https://www.socialworkers.org/About/Ethics/Code-of-Ethics/Code-of-Ethics-English>.

② https://www.ifsw.org/wp-content/uploads/ifsw-cdn/assets/Russian_ethical.pdf.

③ https://www.ifsw.org/wp-content/uploads/ifsw-cdn/assets/ifsw_12405-10.pdf.

④ <https://sasw.org.sg/wp-content/uploads/2021/04/SASW-Code-of-Professional-Ethics-3rd-Revision-online.pdf>.

通过的《全球社会工作伦理原则声明》强调，社会工作者有责任促进人们实现社会正义，无论是整体社会上的，还是他们与之一起工作的人们的。这意味着，社会工作者要挑战歧视和制度性压迫、尊重多样性、倡导和致力于获得平等资源的机会、挑战不公平的政策与实践、建立团结。^①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社会工作大家庭的一员，我国的社会工作伦理也强调社会正义这一核心价值。民政部 2012 年发布的《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指引》第二十一条规定：社会工作者应运用专业视角，发挥专业特长，参与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完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社会福祉。第二十二条规定：社会工作者应正确鼓励、引导社会大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推动社会建设。^②由此可见，无论中外，社会正义均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不仅影响着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专业目标的追求，而且影响着他们对社会工作实践方法的选择。

虽然社会正义被认为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但要想促进社会正义，成为一名有道德的社会工作者，就必须通过倡导来支持社会正义。社会工作者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是促进平等和社会正义的公认的专业义务（Nouman, 2020）。社会工作中的政策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正义的价值，认同这种价值的社会工作者更加支持被认为是寻求进一步实现这一社会目标的干预类型，因此更有可能采用政策实践的方法（Weiss-Gal and Gal, 2008）。将更多的“社会”方面和社会正义视为社会工作活动基本焦点的人，也倾向于强调需要采取那种将为实现社会正义做出贡献的实践方法。尤其是，他们强调社会工作者直接参与社会政策形成和修订之中的重要性（Gal and Weiss, 2000）。政策实践是社会工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把政策实践纳入社会工作实践的日常生活，是提升社会与经济正义之专业目标和使命的一个有效的和有力的途径（Cummins et al., 2011）。反之，如果没有政策实践，这些社会工作的目标和价值只会成为获取社会工作学位考试中阅读和复制的文件（Pawar, 2019）。如果社会正义的价值意味着确保所有人都能平等获得基本社会物品，那么诸如个案管理者和治疗师等社会工作者的典型角色就无法获得这些社会物品。这并不是要否认这些角色的优点，而是要指出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确保更公平地分配机会。迈向社会正义的进步，要求直接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和修改（Figueira-McDonough, 1993）。学者对以色列 27 家社会服务机构 411 名社会工作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研究样本中，越重视促进社会正义这个专业目标的社会工作者，他们支持和参与政策实践的程度也越高（Weiss-Gal and Gal, 2008）。

二、政策实践的理论基础

社会工作除了是一个基于价值的专业外，还是一个理论驱动的专业。实践理论影响着社会工作者评估和干预儿童、成人、家庭和社区等的方式（Langer and Lietz, 2015）。社会工作实践十分复杂，不仅需要人类发展和行为的知识，而且需要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知识，以及所有这些因素相互作

① <https://www.ifsw.org/global-social-work-statement-of-ethical-principles>.

② <http://www.bjtzscl.org.cn/a/zhengcefagui/2021/0417/140.html>.

用的知识。当社会工作者评估一个服务对象、一个情境及干预的结果时，他们倾向于采用一种符合他们对人类本质看法的基本的实践理论（Cox et al., 2018）。

然而，支撑社会工作实践的理论远非整齐划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工作实践的理论就是建立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基础之上，它们也将反映其母学科中存在的范围、多样性和分歧。虽然在某些圈子里，心理学和社会学正融合在一起，但这两个学科仍然在社会工作理论中造成了对个人困难的心理解释和结构解释之间的分歧（Davies, 2013）。在个人和环境两个层次上理解问题和指导改变努力（change efforts）是良好的社会工作实践的重心。社会工作者采用哪一种取向取决于他们认为问题起源于何处。如果社会工作者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人们自身，他们就会将所有的努力指向个人。如果他们认为问题的原因在个人之外，他们就会关注改变环境。虽然有些问题完全取决于个人，有些则完全取决于环境，但大多数问题都有多重原因，如果社会工作者不能同时处理个人和环境两方面的原因，他们就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Segal et al., 2019）。

至 20 世纪中叶，心理学主导了社会工作实践知识。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对个人及其环境的双重关注才在社会工作理论中重新得到重视。1964 年，霍利斯（Hollis Florence）敦促社会工作者采用“社会心理”视角，也就是说，要认识到评估干预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方面。此时，心理动力学理论（psychodynamic theory）已经失去了它在社会工作中所具有的统一影响力的地位，由于采用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工作者和那些采取实践取向的社会工作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个专业正在分裂。至 60 年代和 70 年代，一些评论家认为，由于其认识到了社会工作者干预的个人的和社会的不同系统，系统理论可以为这个专业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Healy, 2014）。

如今，社会工作者使用的大多数理论都是从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所提出的一般系统理论里发展出来的。贝塔朗菲描述了包括人体在内的生命系统的功能。科学家们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人体内的各个系统是相互联系的。人体系统的故障通常会影响到其他系统和整个身体的功能。自其提出以来，贝塔朗菲的框架已被应用到包括社会工作在内的许多领域的系统之中（Segal et al., 2019）。

虽然生态理论和系统理论是作为独立的框架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它们对人类行为的潜在解释是相似的，因而它们经常被整合在一起称作生态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源于其内部，需要通过观察人们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加以解释（Langer and Lietz, 2015）。基于该理论而得到复兴的“人在环境中”视角是社会工作的一个基本理念。该理念认为，当在环境背景下看待困难时，个人的问题才可以得到最好的解释。环境包括与家人、朋友、同伴、同事和社区成员的关系，人们居住的地区以及该社区可能提供或可能不提供的保健和社会服务，周围的物理环境，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信仰和传统。另外，环境还包括宏观系统的影响，譬如，可能促进一个人或阻碍一个人潜力的地方或联邦政府的政策（Langer and Lietz, 2015）。社会政策和项目是我们生态的一部分。生态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一系列关系。社会工作者在评估影响其服务对象的环境因素时，倾向于包括更广泛的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当然，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个人的

经历深受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背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此外，生态观点将注意力引向环境中的风险因素和保护性因素，这些因素可以促进或阻碍人们实现目标的努力。社会政策和项目可以通过提供所需的福利和服务来帮助服务对象，也可以为服务对象制造障碍。“人在环境中”视角将个体及其与不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视为一种双向交换，其中，相互作用由复杂的反馈循环连接起来。因此，社会工作者可以使用“人在环境中”视角来审视环境，并理解连接服务对象和政策的相互作用和反馈机制，以便制定有效的政策（Chapin, 2014）。简而言之，社会政策影响我们所服务对象的环境，从而影响我们帮助他们的能力。为了有效地帮助服务对象，社会工作者至少需要做这种“双重评估”，这样才可以确定影响服务对象的具体政策问题，并考虑是否有必要使用政策实践技能进行干预（Chapin, 2014）。

当社会工作者使用“人在环境中”视角时，他们把人放在一个背景之中。虽然许多社会工作实践注重帮助个体改变其思想和行为以利于他们实现目标，但这种微观的焦点并不是社会工作者实践的全部（Cummins et al., 2011）。同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分别仰赖于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不同，政策实践是建基于系统理论和生态理论，抑或“人在环境中”视角之上的，把社会工作同其他专业区分开来的系统或生态观点，要求所有的社会工作者均要努力塑造那些指引社会、具体的机构和具体的项目的规则（Jansson, 1990）。

社会工作的哲学和使命是建立在助人原则基础之上的，这些人既在他们的个人情境中，也在他们的集体环境中。由于人在环境中的观点始终把个人置于他们的社会环境背景之中，所以社会工作者的注意力被定位于既帮助个人改变，也帮助他们实现周围环境的改变。从“个案转向原因”（case to cause）的取向，焦点超越了个别服务对象，认识到了类似情境中的其他人，辨认出了广泛的社区需求，努力建构对政策改变的支持。采取这种取向，改变过程的目标（targets）不是个人，而是阻碍服务对象发展或压迫服务对象的事物。政策实践谋求排除环境障碍，并增加个人和家庭可用的机会（Cummins et al., 2011）。个人的问题和不幸不仅植根于个人因素，而且也植根于社会因素。如果不幸的根源确实在于环境而不是个人，那么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就是改变那些对服务对象有负面影响的外部因素。政策实践是最适合促进这一目标的干预类型（Weiss-Gal and Gal, 2008）。

三、政策实践的现实基础

社会工作除了是基于价值和理论驱动的专业外，还是一个回应社会需要的专业。在前工业社会，依赖（dependency）不是一个大问题，其主要由家庭、教会和社区来处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业化，相关制度开始崩溃，依赖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当工业社会认识到依赖是一种威胁状态时，就进化出一种社会机制（一种技术或一个专业）来处理它，这就是社会工作（Popple, 1985）。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以一种正式的方式分配了这项任务（assignment）。相反，技术或专业是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出现的，更多是出于环境，而不是出于理性的策略。虽然专业的任务通常或多或少地围绕着一个具体的领域，但它们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连续体上的。连续体的一端涉及直接关注的问题，

而另一端是促进积极状态。因此，医学被指定为在连续体的一端治疗疾病，在另一端促进积极的健康状态。教育一方面致力于消除无知，另一方面致力于知识的传播。社会工作的任务有类似的活动范围，即对人们依赖问题的社会处遇（social treatment）和促进相互依赖的积极状态。此外，每个技术领域不仅负责为个人提供服务，而且还负责为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系统提供服务。医生不仅治疗个体的疾病，还参与公共卫生事务。老师不仅教算术，而且有义务影响教育政策。因此，社会工作者不仅要使人们减少依赖，还被期望在形成依赖性的地方影响社会系统（Atherton, 1969）。社会工作实践的社会基础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对一个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的基本要求是开发和实施社会服务项目。当社会认定一些个人经历了一种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满足其需要并且这种尚未满足的需要对他们自身的福利和个人发展的机会以及社会的福利构成威胁时，这些社会服务项目就应运而生了。

以慈善组织会社运动和睦邻组织运动为代表的社会工作先驱，在实施社会所指派的任务中即体现了社会工作的这种“双重焦点”。慈善组织会社运动是临床社会工作的先驱，它集中于个人和家庭，用科学的方法确定需求，并对社会服务提供者进行专门培训。睦邻组织运动是非临床社会工作的先驱，主要强调个人作为其社区的一部分，开展社会需求评估、社会改革和政治行动，以及对社区的研究（Ambrosino et al., 2016）。

然而，受追求专业地位的影响，社会工作在后来的发展中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这种“双重焦点”。1915年，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全美慈善与矫正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吗？》的主题演讲，认为社会工作“边界太宽”，难于进行专业训练，因而尚未形成一个专业。作为对弗莱克斯纳的回应，社会工作者开始根据专业的抽象定义而不是社会需要来组织和架构他们的工作。杰弗里·理查森-布兰特（Jeffrey R. Brackett）等社会工作领导者认为，社会工作必须缩小其焦点，发展教育上可传播的技术，以便成为一种被接受的专业。所有人都同意，最适合发展的技术是与个人一起的个案工作。到1925年，寻求专业地位的社会工作者使用弗莱克斯纳的专业标准，将他们对社会工作的定义缩小到以精神病学为导向的个案工作。其间，他们尽量减少或完全取消了公共福利、社会和劳动改革以及诸如联络和资源动员等“不太专业的”技术（Popple, 1985）。

当1929年经济大萧条袭来，罗斯福于1933年推出新政时，社会工作者没有组织起来以满足国家的需要，主要原因似乎就是社会工作当时所追求的专业化模式。该模式提供专业的治疗技术，但服务对象需要倡导、经纪、福利管理和规划等服务项目，该模式更喜欢私人机构和诊所，而大规模的新项目是在公共机构；这个专业严格坚持所有的训练都应该是研究生水平的，然而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却是面向本科生甚至更低水平的人开放的。由于主流社会工作在大萧条时期未能满足国家的需要，从而导致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分裂。一部分是追求专业化传统目标的主流社会工作者，他们一般受雇于私营机构、遵循个人改变的治疗模式；另一部分是那些回应国家经济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工作者，他们大多受雇于公共机构，对有效实施公共福利项目更感兴趣，而不是为服务对象提供治疗

(Popple, 1985)。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应国家经济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工作者并没有形成气候，主流社会工作者重新获得了对专业的完全控制。在整个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社会工作者仍然坚持对技术的执着，仍然坚信完善教育上可传播的技术是获得专业地位的关键。E. 格林伍德 (Ernest Greenwood) 1957 年发表的《专业的属性》一文，标志着社会工作对专业地位的思考从特质模型 (trait model) 转向了过程模型 (process model)，从职业连续体的角度确立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 (Popple, 1985)。尽管如此，作为社会工作方法“女王”的个案工作依然在社会工作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许多方面被视为专业社会工作实践的整体。虽然小组工作得益于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小组理论的阐述，但社区组织在理论上似乎发展得不太好，而且经常被看作既不是个案工作，也不是小组工作的剩余方法，“社会政策”一词似乎也容易遭受被怀疑的命运。

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骚乱引起人们对社会工作的质疑。人们认为，当前社会工作中所采用的治疗性取向要么没有充分认识到导致人们陷入贫困的原因、生活的复杂性、转型和不利的环境背景，要么没有满足穷人的需要对环境进行结构性改变 (Hopps et al., 2008)。同时期兴起的专业的权力模型 (power model)，开启了社会工作对自身追求专业地位的批判性反思，指责社会工作者过于关注个人处遇，在追求专业地位的过程中放弃了社会改革 (Popple, 1985)。因而，社会工作者除了注重传统的社区组织的宏观角色外，亦开始主张发展政治和社会政策的技能 (Popple, 2018)。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詹森提出了政策实践的概念。詹森在解释他为什么要给社会政策增添干预成分时指出，如果美国等福利国家的许多政策都有缺陷，我们怎能不在社会福利政策文献和课程中讨论社会工作者可以用来改变它们的具体技能和干预措施呢？(Jansson, 1990)

20 世纪 30—50 年代，随着“治疗”变得制度化和法定供给的扩大，英国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组织运动的影响都有所下降。以前由慈善机构自愿提供的福利服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提供的服务范围。国家负责解决贫困、劣势和不平等问题，社会工作负责少数落在福利网之外的人。因此，1948 年，英国地方当局承担起了被视为“主要的”社会工作任务的责任。至 50 年代末，大多数社会工作者都受雇于这样或那样的法定机构，代表国家向儿童、老人、残疾人 and 无家可归者等提供服务 (Evans et al., 2016)。

除英美国家之外，亚太地区国家社区的需求和问题的性质就其规模和范围而言需要政策实践取向。亚太地区国家地理面积广阔、人口众多，直到今天，该区域的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农村地区，缺乏基本服务和设施，如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充足的营养食品、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保健、教育和住房。虽然通过社会发展取向和千年发展目标以及目前正在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贫困和失业仍然是该地区的主要问题。如果没有社会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士的政策实践取向，仅仅因为后勤问题就很难接触到这些地方层面的社区。该地区正在发生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快速流动。这种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趋势将对已经陷入困境的城市基础设施造成巨大压力，并创造更多的基本服务需求。正如过去所发生的那样，大多数穷人生活在贫民窟，

导致大规模的贫民窟定居点。这些新出现的问题也要求社会工作者采取社会政策实践和社会发展取向（Pawar, 2019）。

四、结语

社会工作不但是基于价值和理论驱动的专业，而且是回应社会需要的专业。无论从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和生态系统理论的人在环境中视角来看，还是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社会工作者利用政策实践方法去实施、完善和创新社会政策势在必行。如同社会工作者利用个案工作方法“做个案”、利用小组工作方法“带小组”、利用社区工作方法“搞社区活动”一样，社会工作者亦可以且应当利用政策实践方法去实施、完善和创新社会政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提出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这意味着社会工作在参与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不但要“坚持”我们现有的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同时还要关注不断“完善”这些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重申：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报告为我国社会工作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中作出新贡献指明了方向。

实际上，我国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呼吁社会工作者利用政策实践方法参与社会治理。例如，王思斌（2014）指出：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具有基础－整合的特征，这表现为其面向底层民众及其基本需要，既治标也治本，既遵循政策规则又重视情理，既注重环境因素也不忽略个人方面的原因，既从事治疗也重视预防和发展，协助居民形成参与和治理经验，既致力于基本服务又从事政策倡导等。再如，李迎生（2014）认为，社会工作者扎根于基层群众中，能及时了解人们的各种问题与需求。社会工作者不仅能够及时发现问题与风险，而且能够借助专业视角对之进行科学全面的分析，是社会风险与问题的“扫描仪”。一旦掌握了社会成员某方面需求未能得到满足的情况，社会工作者就能够承担起代表他们向政府、社会呼吁，倡导制定、修改社会政策的职责，以将社会风险消解于萌芽状态。

另一方面，我国亦有一些社会工作者已经开始利用政策实践方法去实施、完善和创新相关的社会政策。有研究对深圳和南京 36 名经验丰富的社会工作者进行了定性研究，结果显示，他们从事政策实践的制度化策略包括：参与政策磋商、直接参与起草政策文件，配合政府开展社会服务试点，协助政府进行研究，利用他们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的角色影响政策。非制度化策略包括：举例说明成功的社会工作干预措施以提出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研究，参加和组织会议或论坛，与媒体合作，与政府官员进行非正式谈话。

总之，伴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工作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需要直接实践方法，更需要政策实践方法。

参考文献

- 李迎生. 探索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路径 [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4, 14(03): 23-28+98.
- 马凤芝. 政策实践: 一种新兴的社会工作实践方法 [J]. 东岳论丛, 2014 年第 1 期.
- 乔世东. 道德实践视野下的社会工作实务 [J]. 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20(02): 84-88+92.
- 王思斌.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J]. 社会建设, 2014, 1(01): 8-15.
- Ambrosino R. et al.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 An Introduction (8th edition) [M]. Boston: Cengage Learning, 2016.
- Atherton C. R. The Social Assignment of Social Work[J]. Social Service Review, 1969, 43(4): 421-429.
- BASW. The BASW Code of Ethics for Social Work. Birmingham: BASW, 2021.
- Chapin R. Social Policy for Effective Practice: A Strengths Approach (3rd edi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Cox L. E., Tice C. J., Long D. D.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An Advocacy-Based Profession (2nd edition) [M]. Los Angeles: SAGE, 2018.
- Cummins L. K., Byers K. V., Pedrick L. Policy Practice for Social Workers: New Strategies for a New Era (Updated edition) [M]. Allyn & Bacon, 2011.
- Davies M.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Work (4th edition) [M]. West Sussex: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3.
- Evans T., Keating F. (Eds.) Policy & Social Work Practice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6.
- Figueira-McDonough J. Policy Practice: The Neglected Side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J]. Social Work, 1993, 38(2): 179-88.
- Gal J., Weiss I. Policy-practice in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Israel [J]. Social Work Education, 2000, 19(5): 485-499.
- Gitterman A., Knight C., Germain C. B. The Life Mode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Adv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4th edition)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 Healy K. Social Work Theories in Context: Creating Frameworks for Practice (2nd edition) [M].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 Hopps J. G., Lowe T. B. The Scope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Barbara W. White (Eds.). Comprehensive Handbook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 The Profession of Social Work[M].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8.
- Jansson B. S. Becoming an Effective Policy Advocate: From Policy Practice to Social Justice[M]. Belmont, CA: Brooks/Cole, Cengage Learning, 2014.
- Jansson B. S. Social Welfare Policy: From Theory to Practice[M].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 Langer C. L., Lietz C. A. Applying Theory to Generalist Social Work Practice[M].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5.
- Nouman H. Between Majority and Minority: A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Culturally Competent Policy Practice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20, 50: 506-524.
- Pawar M. Social Work and Social Policy Practice: Imperatives for Political Engagement[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2019, 1(1): 15-27.
- Popple P. R. Social Work Practice and Social Welfare Policy in the U.S.: A Histor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Popple P. R.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A Reconceptualization, Social Service Review[J]. 1985, 59(4): 560-577.
- Segal E. A., Gerdes K. E., Steiner 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fession of Social Work (6th edition) [M]. Boston: Cengage, 2019.
- Weiss-Gal I., Gal J. Social Workers and Policy- Practice: The Role of Social and Professional Values[J].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2008, 34(4): 15-27.

and cooperation with economic system.

Keywords: Social Policy, People-centered,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Dimensions, Functions and Innovative Paths of Social Policy

.....*Xi Heng, Wang Han* 21

Abstract: I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s a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realizing the soci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ll members of the society, social policy should be inclusive, sharing and developmental, and in agreement and synergy with economic policy and public policy, it should continuously realize its policy function of safeguarding and guaranteeing the soci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ll members of the society. Inclusive social policy is a responsive policy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inclusion of people, risks and changes; sharable social policy is a supportive policy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consensus of cooperation, sharing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benefits; and 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 is the promotional policy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capacity enhancement, goal enhancement and policy synergy. Innovation in the content, the mechanism and the concept of social policy are the basic paths to realizing the inclusiveness, sharing and developmental nature of social policy.

Keywords: Social policy, Inclusiveness, Sharability, Development, Policy innovation

Three Foundations for Social Workers' Involvement in Policy Practice

.....*Ma Fengzhi, Chen Shuqiang* 34

Abstract: Social work is a profession driven by both values and theory, and it also responds to societal needs. The values of equity and justice,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and the practical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constitute the three fundamental bases for social workers' involvement in policy practice. Social workers can and should use policy practice methods to implement, improve, and innovate social policies.

Keywords: Policy practice, Equity and justice,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Practical basis

Improve Policy Integration: Research on the Connection of the National List for Basic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China

.....*Hu Hongwei, Wang Jiayi* 43

Abstract: Recently, the national list for basic elderly care services was introduced to address the problem